

盧雪所認識的拉內與巴爾大撒

吳伯仁 譯¹

卡爾·拉內（Karl Rahner，1904~1984，簡稱「拉內」）和漢斯·巴爾大撒（Hans Urs von Balthasar，1905~1988，簡稱「巴爾大撒」），兩位大師都是二十世紀最有影響力的天主教神學家。威內爾·盧雪²（Werner Löser，簡稱「盧」）乃兩位共同的學生及朋友，我們可藉本文從布萊恩·胡格斯（Brian W. Huges，簡稱「胡」）對盧雪的訪問對談中，多認識一些兩位大師的關係，以及梵二對教會的影響。

胡：你是怎麼認得拉內和巴爾大撒的？

盧：我第一次遇到拉內是在1962~1965年期間，那時正值梵二大公會議的召開，我在普拉克（Pullach）耶穌會的修道院讀哲學。普拉克位置在慕尼黑南方的一個小村莊。拉內曾

¹ 本文是一篇訪問稿，訪問者胡格斯當時是波士頓學院（Boston College）神學博士候選人。原文題名“Karl Rahner and Hans Urs von Balthasar: An Interview with Werner Löser”。登載於 *America* (October 16, 1999), pp.16~20。譯者吳伯仁神父，耶穌會士，現為輔仁大學神學院神學博士候選人。以下的註解，都是譯者為讀者閱讀的方便所加，原文沒有。

² 盧雪神父出生於1940年10月4日，1960年4月26日進入耶穌會，1970年7月25日領受司鐸聖職，現於德國法蘭克福聖喬治神哲學學院（Philosophisch-Theologische Hochschule Sankt Georgen Frankfurt am Main）擔任信理神學和大公主義神學的教授。

經在那裡讀哲學，有時他會來拜訪，告訴我們大公會議的進行情況如何³。

這段期間，拉內在慕尼黑大學擔任宗教哲學的講座教授，講授神學中心課題。在普拉克和慕尼黑聆聽拉內的演說實在是令人興奮的事，因為那時他在大公會議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這些演講後來集結在《信仰的基本課程》⁴這本書中出版。

1960~1962 年期間，我是一位耶穌會的初學生，那時的情況和現在是十分不同的。拉內的書不會存放在我們圖書館的架上。初學導師怕他的書有不好的影響，只有一些年長的初學生得到特別的許可，才能閱讀《神學研究論文集》⁵的第三冊，因為書中包含著一些靈修的文章，這為那時代來說，是典型的保護行為。

後來，我寫博士論文時，拉內的母親常邀請我去她在夫萊堡（Freiburg）的家喝茶，有時就在那裡遇到拉內，有與他交談的機會。我通常也會在一些神學研討會看到他。雖然我們屬於不同的世代，但是我們都是耶穌會士，所以這麼多年來，我們能夠在正式和非正式的場合中，分享我

³ 梵二期間，拉內擔任維也納客尼格樞機（Cardinal Franz König）的專家顧問（Peritus），參與大公會議。

⁴ 德文原本：Karl Rahner, *Grundkurs des Glaubens: Einführung in den Begriff des Christentums* (Freiburg im Breisgau: Herder, 1976)；英文譯本：*Foundations of Christian Faith* (London, 1978)。

⁵ 拉內在 1954 年出版《神學研究論文集》（*Schriften zur Theologie*）德文版的第一冊；1984 年出版德文版的第十六冊，亦即英文版 *Theological Investigations* 的第廿二、廿三冊。

們的經驗。他知道我對於他的神學有一些保留。他也知道
長久以來我對於巴爾大撒的神學深感興趣。

胡：爲何你選擇不跟隨拉內的神學？

盧：1965年，我完成了哲學課程，正在尋找和哲學有緊密關連的神學，這時我意識到拉內非常熟悉現代哲學家，包括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黑格爾（Georg W. F. Hegel，1770~1831）和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1889~1976），他們啓發了他的思想。那時，我對哲學的興趣是如此強烈，以致我想神學一定和哲學有密切的關係，是不能用別的方式來處理的。

但是，1966年我的想法改變了。有一天早上，當我在讀拉內的一本書時，有一思想突然觸動了我，即拉內的神學受到了他自己哲學思考的限制。我也瞭解到拉內不能夠回答一些神學的問題。這爲我來說是一個震撼，因爲長期以來，我準備自己讓拉內成爲我的神學導師。但是，我發現神學需要察覺到它的出發點，就是要專注於聆聽天主的話。天主的話在以色列民族和耶穌基督具體而偶發的歷史中，啓示出來。

我開始質疑拉內的神學，他太過於專注在先驗觀念（transcendental ideas）之上，使他有困難將天主的話作爲首要的對象（the primary subject）。至今，我仍然相信這是拉內神學主要的問題所在。同時，我們須承認神學的觀念是不會沒有歷史根據的。我記起拉內很重要和很著名的一篇文章〈象徵的神學〉⁶，在這文章中，他以一種特殊的

⁶ 德文原文：Karl Rahner, "Zur Theologie des Symbols," in *Schriften zur*

方式，將有限靈性的實體（spiritual and finite realities）與歷史和物質的世界連結在一起。雖然拉內關切超驗神學，但不表示他的思想就缺乏歷史的具體性。

即使如此，當我意識到拉內神學思想的一些限度後，我請教另一位耶穌會會士，他剛完成他的神學。他推薦我研讀巴爾大撒的神學。以前，我從來沒有聽過巴爾大撒的名字，但是我到圖書館，找到了他的一本書《天主和現代人的問題》⁷。這本書使我立刻著迷。我發現巴爾大撒比拉內更具體、更試著運用天主在歷史中的言語。現在，我不會宣稱，介於拉內的超驗的神學方法進程（approach）和巴爾大撒的現象學神學方法進程之間，有多麼大必要性的差異，但這兩者的差異性確實是存在著的。因此，我就開始去讀巴爾大撒其他的書，如《聖言成了血肉》⁸和《聖言的淨配》⁹。

Theologie Band IV: Neuere Schriften (Einsiedeln, Switzerland: Benziger Verlag, 1956), pp. 275-311; 英文譯文：“The Theology of Symbol,” in *Theological Investigations Volume 4: More recent writings*, trans. Kevin Smyth (London: Darton, Longman & Todd, 1966), pp. 221-252.

⁷ 德文原本：Hans Urs von Balthasar, *Die Gottesfrage des heutigen Menschen* (Wien und München: Herold, 1956)；英文譯本：*The God Question and Modern Man*, trans. Hilda Graef (New York: The Seabury Press, 1967).

⁸ 德文原本：Hans Urs von Balthasar, *Verbum Caro (Skizzen zur Theologie I)* (Einsiedeln, Switzerland: Johannes Verlag, 1960)；英文譯本：*Explorations in Theology I: The Word Made Flesh*, trans. A. V. Littledale and Alexander Dru (San Francisco: Ignatius Press, 1989).

⁹ 德文原本：Hans Urs von Balthasar, *Sponsa Verbi (Skizzen zur*

但，這只是一個開始。1967~1971 年間，我在法蘭克福 (Frankfurt) 讀神學。我依照課程的安排，也到課堂上聽課。但是巴爾大撒的思想仍然吸引我的注意力，所以我繼續研讀他的書。後來，我寫了有關巴爾大撒神學某一主題的碩士論文。

1971 年，爲了寫博士論文，我搬到夫萊堡。現任梅因斯 (Mainz) 教區主教兼德國主教團主席的卡爾·列曼 (Karl Lehmann, 1936~) 成了我的老師。他曾是拉內在羅馬和慕尼黑時的助理。但是後來他和巴爾大撒合作，一起創立一份神學雜誌 *Communio*。他和我對於巴爾大撒有共通的興趣，但他仍與拉內有所連繫。在他的指導下，我決定以巴爾大撒對於教父神學的詮釋，作爲我博士論文的主題。

當我在寫論文的時候，我到巴塞爾 (Basel) 拜訪巴爾大撒。那是在 1973 年中的一個機會，巴爾大撒邀請我跟他，以及他長期的度假同伴亨利·魯巴克 (Henri de Lubac, 1896~1991)，一起去山上度假。我加入他們的度假行列有兩星期之久。日常生活的節奏十分簡單。我們輪流每天早上準備餐點和主禮奉獻感恩祭。一天晚上，我看著窗外，似乎這將是晴朗無雲的一天。我靜靜地離開我的房間，希望看到日出。那時大約清晨三點三十分。當我正要離開的時候，我注意到巴爾大撒房間的門開著。他正在工作。通常，晚上他睡得很早，睡了短短的時間，而後很早起來工

Theologie II (Einsiedeln, Switzerland: Johannes Verlag, 1961); 英文譯本: *Explorations in Theology II: Spouse of the Word*, trans. A. V. Littledale and Alexander Dru (San Francisco: Ignatius Press, 1991).

作。啊！他看到我正要離開房屋，就對我說：「你要到那裡去？」我回答：「我想要去看日出。」他說：「哦！我和你一起去。」因此，我們一起走上山，去看日出。

這是一次不算短的健行。一路上，巴爾大撒傾訴他對耶穌會的想法和感受。巴爾大撒於 1950 年離開了耶穌會。這是一個傷痛的事件。二十年後，當他再度回憶起這一事件，感到更為傷痛。我記得他這樣說：「我仍是一個耶穌會士，但是過著一個流放的生活。在我內心裡，這是一血淋淋創傷的情境。」正如魯巴克有回寫下：「巴爾大撒仍是一位熱誠的聖依納爵弟子」¹⁰。事實上，巴爾大撒晚年時，曾嘗試重新加入耶穌會。耶穌會總會長伯鐸·柯文伯神父（Peter Hans Kolvenbach, SJ）已經準備好接受他的請求了，但是巴爾大撒卻於 1988 年壯志未成身先死了。

胡：雖然你已經暗示，但是我仍想請問你巴爾大撒和拉內是怎樣的人？

盧：巴爾大撒於 1905 年出生在瑞士一個貴族的家庭。他在音樂、戲劇和文學的環境中成長，也喜愛音樂、戲劇和文學。他是迷人的、親切的，而且高雅地穿著。但這也是他的問題之一。因為他的家庭背景，在貴族家庭中成長和高尚的氛圍，巴爾大撒沒有太多的機會和窮人接觸。相反地，拉內是一個普通但是強壯、充滿活力的人，外表為他不是那

¹⁰ 參照 Henri de Lubac, "A witness of Christ in the Church: Hans Urs von Balthasar," trans. Andrée Emery, *Communio* 2, (Fall 1975), p.231; 此篇文章已被收錄在 David L. Schindler ed. *Hans Urs von Balthasar: His Life and Work* (San Francisco: Ignatius Press, 1991), pp.271~288; 引文在 273 頁。

麼重要。拉內也是一個思想家，甚至是一個沉思者。當他談論他的思想時，不在乎別人的想法。然而，他們兩人不是那麼複雜，都是簡單和富於憐憫的人。拉內十分喜愛吃冰淇淋和作長途車子的旅行。

胡：就你的經驗來說，拉內和巴爾大撒兩人的關係如何？是否他們兩人有機會向你談論起對方？

盧：他們倆從 1930 年起，就彼此認識。他們年紀相仿¹¹，隸屬於耶穌會在德國的同一會省，但是他們在不同的地方念書。當拉內在荷蘭范侃堡 (Valkenburg, the Netherlands) 念神學時，巴爾大撒正在法國里昂 (Lyon, France) 念神學。無論如何，他們彼此了解，也經常碰面。甚至三、四十年以後，他們仍然感興趣和相互尊重地注意彼此，並在畢生中試著了解對方的思想。有時當我看到拉內時，他會問我：「你認識的那個巴仔 (Baltz)，他正在做什麼？」雖然我告訴他的，他已事先知道了！同樣地，當我遇到巴爾大撒時，他會問我：「拉內正在做什麼？」

胡：究竟拉內和巴爾大撒的神學基礎或出發點上，有何共通點？他們的差異又是什麼？

盧：有一些要點如下：首先，拉內的哲學影響來自於德國觀念論，從費希特 (John G. Fichte, 1762~1814)、康德、黑格爾，到海德格的思想。但對巴爾大撒來說，文學和音樂是更加重要的，諸如：哥德 (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1749~1832)、席勒 (Friedrich von Schiller, 1759~1805)、尼采 (Friedrich W. Nietzsche, 1844~1900)，甚至是莫扎

¹¹ 事實上，拉內比巴爾大撒大一歲。

特 (Wolfgang Amadeus Mozart, 1756~1791) 的影響。一個哲學，相對於另一個文學和音樂，兩者之間的差異，為我們了解他們的背景是相當重要的。

巴爾大撒是一位**接受性的思想家**，他渴望以現象為主來理解事物，渴望注視和聆聽、渴望觀察型狀、輪廓，而認出結構，和意識到它們內在的必須性。然而，拉內是一位**建構性的思想家**。基本上，他傾向新柏拉圖主義、理想主義和先驗思想的傳統。拉內渴望透過神秘經驗的範疇來了解人和天主的關係。的確，拉內整體的神學是關於每一個人在日常生活中神秘經驗的理論，是對於慈悲地接近我們的天主經驗的思考。

其次，拉內和巴爾大撒兩位都是生活在聖依納爵 (Ignatius of Loyola, 1491~1556) 及其神操經驗的傳統中。這個影響，卻在不同的方向上塑造了他們的神學。對拉內來說，神操的核心在於所謂「做一個正確良好的抉擇的第二種時間上」(操 176)¹²。在神秘經驗的光照下，它亦即專注於做出實存和倫理上的決定。對巴爾大撒來說，神操的核心建基於不偏不倚地向天主開放，也就是聆聽和接受天主的召叫，而後跟隨它。按照他的觀點，神操主要的主題是「耶穌基督王國的默觀」(操 91~100) 和「對十字架上基督的對禱」(操 53)。這些對於神操不同的強調，真確地符合了他們對於天主和世界接觸上不同的途徑。

¹² 參照侯景文譯，《神操—通俗譯本》(台北：光啓，2003)，176號(簡稱：操 176)：「幾時因種種神慰或神枯，以及辨別各種神類的經驗，得到了光照和認識。」

第三，巴爾大撒和拉內具有同樣的歷史出發點，這出發點建基在摩里斯·布隆德 (Maurice Blondel, 1861~1949) 和他兩本有名的書：《行動》(*L'Action*, 1983) 和《書信》(*La Lettre*, 1896)。布隆德是一位法國的天主教哲學家，以他強烈和虔誠的信仰實踐爲人所知。他十分了解他那時代的神學，認爲教會和無信仰者討論時，無法保護自己的神學，因他們不會了解。所以，身爲一位哲學家，布隆德發展出一套向神學開放的哲學型式辯證法 (a philosophical form of argumentation open to theology)。他所提出的，就是所謂的「內在性的方法」(method of immanence)。

胡：你如何定義這「內在性的方法」？

盧：每一個人在他的心靈中，有一自然的傾向，渴望與神接觸。這位神，並不是一位中性的神，不是一位抽象的神，而是一位有位格的神，祂是愛。這裡有兩個本質性的要點：我們每一個人都有一自然的傾向，渴望和一位良善、慈悲的神相遇；但是，沒有人能夠靠他自己的力量製造出這樣的相遇。如果此一天人相遇真實地發生了，它是藉著這一慈悲的神的恩寵而成就的。

胡：我們所談及此一顯露的「事件」，若用拉內的說法來說，是不是天主將祂自己通傳給受造物？

盧：是的！在這一世紀中，此一宗教哲學思想已成了所有天主教思想的共通背景。但是，我們可從兩個不同的方向，來了解布隆德思想的應用：第一個途徑與馬雷夏 (Joseph Maréchal, 1878~1944) 有關；另一個途徑則與普齊瓦拉 (Erich Przywara, 1889~1972) 有關。

馬雷夏是在神秘經驗的光照下，來理解布隆德的洞察的。1927年，馬雷夏寫了有關此一主題的書《形上學的出發點》（*Le Point de départ de la métaphysique*）。在這本書中，他提供了神秘經驗的理論。神秘經驗有一介於有限和無限之間，本體稍縱即逝的覺醒，此一覺醒是神秘經驗的核心。

普齊瓦拉則是藉著強調神和祂受造物之間的差異性，來闡述布隆德的思想：神是超越、無限而神聖的存有者。相對來說，所有受造物都是有限而相對的，他們只在類比概念之下才是存有物。相對於馬雷夏強調有限與無限存有者之間神秘的結合，普齊瓦拉的神學方法進程卻堅持創造者與受造物之間的差異。的確，普齊瓦拉的主要工作是《存有者的類比》¹³。

當巴爾大撒在普拉克研讀哲學，為獲得哲學碩士的學位，他寫了有關普齊瓦拉的書一篇小論文。當拉內研讀馬雷夏和採用他的論點，亦即神秘經驗的哲學和神學，巴爾大撒則在研究普齊瓦拉和了解基於神和受造物差異觀點的哲學和神學。此兩位神學家總是在思考在神和受造物之間關係的歷史，並發展出他們富個人色彩的創造性神學方法進程。

所以，當拉內出版他的兩本書《在世界中的精神》¹⁴和

¹³ Erich Przywara, *Analogia Entis: Metaphysik* (München: Verlag Josef Kösel & Friedrich Pustet, 1932).

¹⁴ 德文原本：Karl Rahner, *Geist in Welt: Zur Metaphysik der endlichen Erkenntnis bei Thomas von Aquin* (München: Kösel-Verlag, 1957)；英文譯本：*Spirit in the World*, trans. William Dych (Herder

《聖言的傾聽者》¹⁵之後，巴爾大撒閱讀了這兩本書，並於 1937 年在一本天主教神學雜誌 *Zeitschrift für katholische Theologie* 上，發表了評論。他表達出對拉內此兩本卓越書籍誠摯的尊重，但是他也提出一個問題：是否缺乏了位際性的思考（interpersonal thinking）？這也是他們神學中一個重要的差異。

1940 期間，巴爾大撒寫了《真理》（*Wahrheit*）這一本書。在此書中，拉內在《在世界中的精神》書中處理的所有主題和問題，都以不同的方式來討論和發展。這些主題包括：人的精神是什麼？什麼是真理？什麼是自由？什麼是存有者？巴爾大撒思考位際相遇（interpersonal encounter）的幅度，基本上，人的生活就在這互動中產生。他也強調存有者的意義，是相互主體性（inter-subjectivity）。反之，拉內考慮個人行為的幅度，因此他強調存有者的意義是主體性（subjectivity）。在某一個程度上來說，他們的思想是互補的。但是馬雷夏和普齊瓦拉不同的神學方法進程，為了解他們不同的神學出發點卻是決定性的。

巴爾大撒和拉內對於教父們的工作有共通的興趣。他

and Herder).

¹⁵ 德文原本：Karl Rahner, *Hörer des Wortes: Zur Grundlegung einer Religionsphilosophie* (München: Kösel-Verlag, 1963)；英文譯本：*Hearer of the Word: Laying the Foundation for a Philosophy of Religion*, trans. Joseph Donceel (New York: Continuum, 1994)；中文譯本：《聖言的傾聽者——論一種宗教哲學的基礎》，朱雁冰譯（香港：三聯書局，1992）。

們兩位都是屬於 1950 年代的那一批，透過對教父著作的研究，帶給天主教神學重要的革新。用一個強有力的說法，他們兩人都是教父神學家。拉內研究所有在教會內對於懺悔的問題有所貢獻的教父們的著作。他的文章是傑出的、也有學術性的內容。這些文章收錄在他的《神學研究論文集》第十五冊中¹⁶。拉內也藉著 M. Viller 更新出版《在教父時期的克修主義和神秘主義》（*Ascese und Mystik in der Väterzeit*）（*Asceticism and Mysticism in the Patristic Period*, 1939）的第二版。這是一本對於教父靈修教導的介紹。

當巴爾大撒在法國里昂念神學的時候，魯巴克和其他出名的教父學者建立了 *the Dictionnaire de spiritualité* 和 *the Sources Chrétiennes series* 的基礎。他們引領他進入教父的世界。巴爾大撒對於教父的思想深感興趣，他也出版關於奧力振（Origen，約 185~254）、額我略·尼撒（Gregory of Nyssa，約 335~394）、馬克西木斯（Maximus the Confessor，約 580~662）思想的文章和書籍。他最初的論點總是關切：是否他們的神學考慮介於造物主和受造物之間差異的神學。

胡：那麼，既然已經知道他們神學的差異性，拉內和巴爾大撒如何對梵二以後的天主教教會作出貢獻，他們又如何看梵二以後的改變？

盧：拉內對於梵二大公會議有顯著的影響。他參與大公會議和會議期間的討論，也幫助準備文件。因此，他的一些神學關注點，也融入在大公會議的文件中。

¹⁶ Theological Investigations: Penance in the Early Church (1982).

胡：特別是在《論教會在現代世界牧職憲章》嗎？

盧：是的！但是拉內對《教會憲章》和《啓示憲章》的影響更大。拉內滿意梵二的成果。梵二以後，拉內屬於那些試著執行梵二文件中的一位。他對在教會內激進改革的發展開放，並向未來看。無論如何，拉內晚年時，他對教會改革的步調越來越感到不耐煩。他深信在於現在的世界和教會訓導文件之間的鴻溝，正在不斷地加深。因此，他開放和無畏地號召在教會內許多徹底的改變。爲許多人而言，他是一個希望的記號；但爲其他人來說，他是一個威脅。舉例來說，他們害怕那些拉內所期盼看到的發展，就是那些在教會內的職務和與基督新教間合一運動領域的發展。

起初，巴爾大撒的觀點跟拉內十分接近。1953年，巴爾大撒出版了一本鮮明而激進的書《徹底破壞稜堡》¹⁷。正如此書的書名，巴爾大撒想要向世界打開教會的門。書中的許多主題，諸如：教會是一個靈性的團體；教會是一個謙遜和貧窮的團體；她和被釘的基督緊密在一起；在其他宗教和文化中認出價值和真理。這些主題爲梵二大公會議所接受，也在梵二文件中可以找到這些主題的內涵。

巴爾大撒的神學與梵二的神學相近，但他不是一位親自參與大公會議的神學家，而是從一個適當的距離來對梵二會議和其文件作觀察。但他不是以一個懷疑者的態度來觀察，而是從所寫的文章，來解釋和支持梵二的文件。但

¹⁷ 德文原本：Hans Urs von Balthasar, *Schleifung der Bastionen: Von der Kirche in dieser Zeit* (Einsiedeln, Switzerland: Johannes Verlag, 1952)；英文譯本：Razing the Bastions: On the Church in this Age, trans. Brain McNeil (San Francisco, Ignatius Press, 1993).

是梵二以後，巴爾大撒經歷了一段個人的困難和懷疑主義（skepticism）的時期，他看到了在梵二文件的執行上，基督徒對自我的理解，以人爲中心主義和俗化上不斷的成長。

胡：是否巴爾大撒也是用這一方式來看拉內的神學，認爲拉內太專注在人學上？

盧：在這段時期，巴爾大撒將拉內等同於這些傾向。1968年，巴爾大撒寫了《基督徒見證的時刻》¹⁸這本書。此書德文版本的書名是 *Cordula oder der Ernstfall*（《科爾杜拉修女或緊要關頭》）。科爾杜拉（Cordula）是一位中世紀的修女，她隸屬於科倫（Cologne）女性殉道者中的一位。書中，科爾杜拉修女支持殉道、擁護嚴肅地見證基督徒的信仰、準備受苦。巴爾大撒主張我們基督徒的信仰必須如此嚴肅，以致於在極端的情況下，我們應接受殉道。同時，他質疑現代神學大多的型式沒有能力提供殉道的動機和力量。在這本書中，巴爾大撒個人性地攻擊拉內。從文學作品的角度來看，此書的文字是滔滔不絕的；而它的內容卻是攻擊性、具有殺傷力。從1967~1968年，由於巴爾大撒在此書的論述，他和拉內的關係受到了損傷。無論如何，往後巴爾大撒更加從正面的方向來評斷拉內。不幸地，今日教會中一些反對改革的小團體，抓緊巴爾大撒在黑暗時期的神學立場，宣稱巴爾大撒支持他們。

¹⁸ 德文原本：Hans Urs von Balthasar, *Cordula oder der Ernstfall* (Einsiedeln, Switzerland: Johannes Verlag, 1966)；英文譯本：*The Moment of Christian Witness*, trans. Richard Beckley (San Francisco, Ignatius Press, 1994).

胡：是否這些團體看到現代世界的趨勢，如同教宗庇護九世將十九世紀的哲學和意識型態視為威脅一樣？

盧：是的！這些小團體用他們對自己有利的眼光，來解釋巴爾大撒的神學，所以是一個單方面解釋的呈現。我相信巴爾大撒不喜歡這樣的解釋。他不喜歡膽怯或是封閉的思考。這種對於巴爾大撒神學的解釋，通常包含了強調阿里恩·斯貝爾（Adrienne von Speyr¹⁹，1902~1967）極端的宗教經驗。她是一位醫生。巴爾大撒和她於1940年間建立一個靈修的團體²⁰。

通常膽怯和反對改革的基督徒思想和行為，是建基在一種危險的末世論上。巴爾大撒思想的中心主題之一，是反對任何型式的雙重預定論（double-predestination）。巴爾大撒的神學深刻地關切天主對每一個人的愛和仁慈。他拒絕奧斯定派和楊森主義雙重預定論的主張。這個主張宣

¹⁹ 1940年，巴爾大撒回到巴塞爾（Basel），任巴塞爾大學的學生指導司鐸，認識了斯貝爾，並幫助她於那年11月1日諸聖節皈依、領洗，進入天主教教會。這次相遇的經驗，奠定了他們往後二十多年一起邁向共通靈修旅程的基石。1984年，巴爾大撒在出版《我們的工作》（德文原本：*Unser Auftrag: Bericht und Entwurf*, 1984；英文譯本：*Our Task: A Report and a Plan*, 1988）一書的〈前言〉，一開始就指出：「這本書有一個主要的目的：避免我死後，任何嘗試將我的工作和阿里恩·斯貝爾的工作分開」。譯者的中譯取自英文譯本第13頁：“This book has one chief aim: to prevent any attempt being made after my death to separate my work from that of Adrienne von Speyr.”

²⁰ 1945年8月5日，巴爾大撒在Estavayer-le-lac領導神操，奠定了聖若望團體的基礎。那年10月15日，他和斯貝爾一起正式建立了聖若望團體女性的一支。

稱天主已經預定了祂所創造受造物中的一部分，得到永遠的生命和光榮，而其他的則被宣判永死和地獄。事實上，有時巴爾大撒非常嚴厲地反對這一型式的神學。他總是強調天主普世性救贖的意願。

巴爾大撒不僅從教父（特別是希臘教父）學習到這一點，而且也從近代法國的男女（其中有一些是詩人）中學習。例如：小德蘭（Thérèse of Lisieux, 1873~1897）、查里斯·培固（Charles Péguy, 1873~1914）、喬治·伯爾納諾斯（Georges Bernanos, 1888~1948）和保祿·克勞德（Paul Claudel, 1868~1955）。再者，在跟魯巴克和雅伯·培固因（Albert Béguin）討論中，他了解到天主救贖全體人類的意願普世性觀點的意義和重要性。這包括了在我們的世界中所發生一切的一般性判斷。我們的世界，包括文學和音樂的世界、宗教和文化的世界，以及經由人們的努力創造出合適人生活的環境。

因為這希望的觀點，巴爾大撒晚年時，受到反對改革者的攻擊；而他也在《我們敢希望所有人會得救嗎？》²¹一書中，回答他們的攻擊。在許多方面，這一本書清楚而確定性地綜合了巴爾大撒的神學方法進程。

胡：說巴爾大撒比其他人更樂觀地來看現代歷史的趨向，是否

²¹ 德文原本：Hans Urs von Balthasar, *Was dürfen wir hoffen?* (Einsiedeln, Switzerland: Johannes Verlag, 1986) 和 *Kleiner Diskurs über die Hölle* (Ostfildern: Schwabenverlag, 1987) 英文譯本：*Dare We Hope "That All Men Be Saved"? With a Short Discourse on Hell*, trans. David Kipp and Lothar Krauth (San Francisco: Ignatius Press, 1988).

公平？他對教會在世界中可見的未來，是否懷著很大的許諾和希望？

盧：確實是懷著很大的希望！但是他也意識到在我們世界中問題的發展。另一方面，他喜歡在每一個地方看到（*logoi spermatikoi*）真理的許多因素。的確！他同時看到了好的和困難的方面。

胡：對於拉內和巴爾大撒的遺產，你看到什麼？

盧：他們兩者都是屬於過去。他們的工作主要是在二十世紀的中葉。他們受到許多二十世紀初期重要思想家的影響，並與同時代的一些人一起工作，如：魯巴克、龔格（Yves Congar, 1904~1995）、奧脫（Otto Semmelroth）、阿諾依·格林邁耳（Alois Grillmeier, 1910~1998）、拉辛格（Joseph Ratzinger, 1927~ ）。這些人都曾透過他們的神學，幫助並準備了梵二大公會議。

過去三、四十年來，我們已經生活在了解和實踐梵二文件的時代。我們正站在他們的肩膀上。像拉內和巴爾大撒這麼好而豐碩的神學，可以作為資源和模範。

我們依靠過去的一代，不錯！但是現在我們面對新而非常根本的問題。我們需要找到新的解答。但，這十分艱難，因為我們前面有不少的考驗和錯誤。拉內和巴爾大撒合適他們的時代，但我們必須做新的事，這是我的希望。